

学文化的故事

[第一本]

本社編



目 次

動員大家學文化	1
安排家務學文化	3
全家學文化	6
四個孩子的媽媽做了小先生	8
朱法弟和她的自來水筆	11
孩子幫媽媽學文化	14
夫妻互助學文化	17
學文化不怕記性差	19
沒有老師自己學	22
大餅師傅學文化	24
海上漁民學文化	26
沒有手指的人學文化	29

動員大家學文化

丁 韻 英

上海申新六廠布機間里，有個衛生保健員蔣品芳，上學期，她1個人動員了20個人學習文化。

她在動員別人學習的時候，碰到的困難真不少。有一次，她去動員女工吳小妹，吳小妹連忙說：“我年紀大，身體吃不消，寫起字來要頭痛。”蔣品芳就對她說：“我開始學文化的時候，也和你一樣。當時我想，學習實在有困難，但又想不認識字，看生產紀錄表，檢查個人保證條件，老是要請別人幫忙，這也不行呀！”吳

小妹听了說：“好吧！我去考慮一下。”

第二天，蔣品芳又去對她說：“學習一定要有決心，我開始讀書的時候，讀了一刻鐘，腦子就要發脹，但是我堅持鍛煉，後來也習慣了。現在即使叫我讀2、3個鐘頭書，也不要緊。我本來是個亮眼瞎子，現在已經讀到中一上，識了很多字，你想想多高興！”吳小妹聽得心動了，就報了名。

還有個女工叫施秀英，每次學校招生，她總不肯報名。蔣品芳經常跑到她車上去，幫她接接头，修修壞生活，順便就動員她讀書。但施秀英仍不肯上學。蔣品芳就和她談家常：我家3代都不識字，地主把“賣絕”田契當借據，騙去了我家1畝7分的好田，逼得全家生活很苦。這件事說到了施秀英的心里。原來她在解放前也吃過不識字的虧。她一班的工頭有個妹妹，工錢比她少。有一次發工資，她發覺鈔票少了，第二天到賬房間去問，才知道工頭欺她

不認識工号，故意把她的工資袋和工头妹妹的对調了。蔣品芳就對她說：“現在雖然沒有人再會調工資袋，但是我們不識字，生產指标挂在牆上，只能看看它，不知道自己完成了多少。如果識了字，知道哪方面差一点，自己加把力也能把生產計劃完成了。假使个个工人都是这样，还怕社会主义不早建設成功嗎！”施秀英听了点点头，蔣品芳見她有点想通了，又動員她3、4次，施秀英終於表示要讀書了，还帮助蔣品芳動員了6、7个工人入学。等到厂校教师下車間招生的时候，蔣品芳已經動員了20个工人，参加了車間識字班。（1956年2月18日）

安排家务学文化

凌 勵

1955年9月里，上海國棉四厂粗紗間的1个工会小組長，去動員女工姜根弟学文化。

姜根弟一听到要讀書，就扳着指头对小組長說：“我有6个孩子，最大的12歲，最小的才8个月。家里还有74歲的婆婆，丈夫参加了基本建設，你替我想想，叫我哪能去讀書？”

过了几天，教师到車間來動員，姜根弟听了后，心里有些动了，回到家里，就和婆婆商量，可是婆婆不同意。那一次，她又沒有報名。到了11月中旬，厂校开始第4次招生，姜根弟听了报告和参加小組討論后，要求学文化的思想又抬头了。她想到國慶節自己到鄭州去望爱人的时候，看到那边都是新式紡織机。自己虽然有一点技術，但是要擋那些新机器，沒有文化可不行啊！

当天晚上，她又和婆婆說自己要讀書，婆婆还是搞不通。姜根弟对她說：“假如你兒子來了信，沒人看，你想想心里急不急？我如果識了字，立刻就可以讀給你听。”婆婆听后不响了。这时候，12歲的孩子也插上來說：“奶

奶，我帮你扫地、洗碗和提自來水，叫10歲的弟弟領4歲的弟弟，讓媽媽去讀書吧！”7歲的女兒也接着說：“我會哄小弟弟睡覺，他躺在搖籃里，

我會搖。”姜根弟听了很高兴，就对婆婆說：“你就照顧3歲的孫女和燒飯吧，洗衣服、補襪子，到星期天我來



做。”婆婆一想，“奶奶，讓媽媽去讀書吧！”小鍾画这样安排也很好，点点头說：“孩子会帮我做家务，那你去報名讀書吧！”

第二天，姜根弟就報名入学。到現在已經2个月了，上星期，她托人寫信給她爱人說：“我現在已經認識了200个字。我想想又高兴，

又懊悔，要是早讀書，恐怕現在可以親手寫信給你。”（1956年2月4日）

全家學文化

凌 勵

每星期有1、2個晚上，是上海卷菸五廠女工夏秀英全家學習文化的時間。夏秀英坐在床邊抄書；大媳婦在寫課本上的生字；二媳婦照着“新中國婦女”雜誌或“勞動報”上的文章在練習寫字；9歲的和7歲的孫兒、孫女坐在夏秀英對面做作文或者讀書；還有一個7歲的孫兒，上學期因為還不到7足歲，沒有進學校，這時也倚在媽媽身邊畫着“描紅簿”；連那2個4歲和5歲的孫兒女，也坐在門口的小板凳上，捧着石板，塗着歪歪斜斜的阿拉伯字。夏秀英和2個媳婦碰到不識的字，就互相研究；要是大家都不識，媳婦們就在小黑板上

記下來，等她們的丈夫回來再問個清楚。

夏秀英今年55歲了。1951年，她開始在廠校里學文化，每天識2個字，回到家里抄抄寫寫，碰到不識的字，她就問2個媳婦。到後來，她識的字比2個媳婦還多了。她對大媳婦說：“將來你也要出去做工作，一定要有文化。你要抽出時間來學習啊！家務我們大家一道來做好啦！”大媳婦聽了，覺得很對，從上學期起，就到民主婦聯辦的夜校去學習了。夏秀英又對二媳婦說：“你搞里弄工作，也要有文化，不能推托工作忙，不學文化。現在你可以先照‘勞動報’上的文章抄抄寫寫，爭取下學期上學校去讀書。”二媳婦也接受了她婆婆的意見。

1月21日，夏秀英在廠校里被評為優秀生，領到了一張獎狀，她的媳婦們看到後，學習的勁頭更高了。

這學期，夏秀英升到中一上學習；二兒子在恆豐紡織廠廠校畢了業，準備考業餘中學；

2个媳妇都到里弄識字班報名讀四年級；最大的2个孙兒女也在小学里念書。夏秀英說：“这也是解放后，共產党帶給我們的幸福啊！”

(1956年2月24日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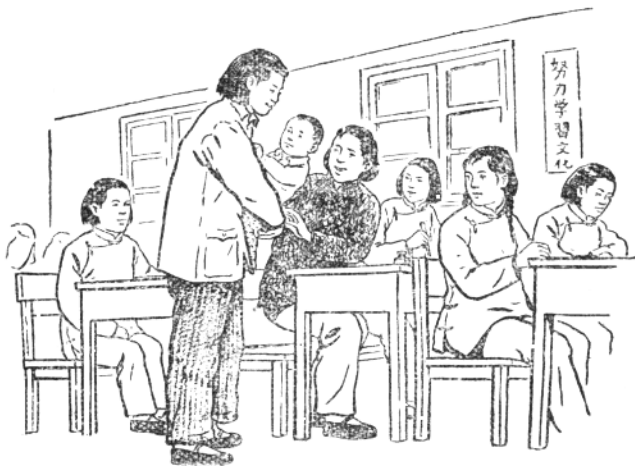
四个孩子的媽媽做了小先生

陈 慧 琳

馬金玉是上海上工制綫厂併綫間的女工，她家里有4个孩子，家务很忙，但是她却能克服困难，从去年夏天起，就担任了羣众教师。

她教的那个班里，一共有10个學員，其中有6个學員要帶着孩子來上課。那时候，天气又热，孩子要吵，有的人就想退学，她动了很多腦筋，帮助她們克服困难。譬如，達到默生字或听寫，她就动员当时不上課的同志給她們抱一下孩子，或者她自己一面上課，一面帮她們抱孩子，讓她們專心寫字。她們在學習

上有了一些成績，馬金玉就及時鼓勵她們，增加大家的學習信心。班上有人生病缺課，馬金



她一面上課，一面幫學員抱孩子。 小鍾回

玉有時候做夜班，沒辦法給她們補課，就動員其他學員互助。有一次，張美英同學生病缺了課，怕跟不上，不想再讀下去了。馬金玉知道後，就和教導主任一起到她家裏去，問她有什麼困難，還把自己過去學文化的情況講給她聽。張美英听了，很感動地說：“我不來上課，你們還特地來看我，幫助我克服困難，這都是

为我好，我一定把缺的課补起来。”

馬金玉担任了小先生后，要备课，要批改作业，工作非常紧张，家里又住得比较远，怎么办呢？她就把家务安排一下，请保姆好好照顾孩子，自己专心搞工作。晚上回去备课，她就叫保姆把孩子带开，或者哄他们早些睡觉。孩子身上的针线活，她自己抽出时间来，做，有时候实在来不及做，就请人家做。看到学员们从一字不识到会看会写，她觉得自己再忙些也是值得的。

这学期，馬金玉班上的学员都升到普一下了，成绩也很不错。最近，当她知道上海市要在2年半内扫除职工中的文盲的时候，很高兴地说：“这是一件大喜事，我一定当好小先生，为扫盲工作出更大力量。”（1956年2月18日）

朱法弟和她的自來水筆

湯孝銘

1953年8月，中央紡織工業部獎給全國勞動模範朱法弟一支自來水筆。筆桿上刻着“獎給工業勞動模範”幾個字，她撫摸着那支筆，真有說不出的高興。因為她從來沒有拿過一支自來水筆。可是她也感到一陣難過：不會寫自己的名字，這支筆在手里不是變成廢物了嗎？黨和毛主席象知道她的心事一樣，過了兩個月，廠里就送她到華東干校去學習文化了。頭一天晚上，她把這支自來水筆拿出來，端端正正扣在口袋上，對她丈夫說：“這一下可用得着這支筆了。”

朱法弟學習速成識字法後，已認識一千多個字了。到快要結業的時候，她第一次用那支筆，寫一封信給她廠里黨委副書記杭蕙蘭，

报告她学习情况和感谢党对她的培养。回到厂里，杭蕙兰对她说：“学习几个月就能写信了，真不简单。”她听了心里乐滋滋的。走进车间，又在出勤卡上熟练地写上自己的名字。

今年5月里，党又送她到华东纺织局上海干部学校去学习，她在暑假回家时对她丈夫说：“学校要在两年中培养我高小毕业，算术我从来没见过，一点也不懂，真把人急死了。”这时候，住在第四室的少先队员陈赞武正在旁边，马上接着说：“不要紧，你把算术书拿出来，我教你。”朱法弟摊开书，拿出自来水笔，说：“弟弟，我不懂什么叫加法，什么叫减法。”陈赞武对她说：“买进的叫加法，卖出的叫减法。”朱法弟又问他：“那末乘法和除法呢？”陈赞武反问她：“1个孩子吃两碗饭，你有3个孩子，他们共吃几碗饭？”朱法弟回答是6碗。陈赞武又说：“这就叫做乘法。我再问你，6碗饭3个孩子分着吃，一个人吃几碗？”

朱法弟又回答：“兩碗。”陳贊武高興地說：“這就是除法呀！”他又教朱法弟怎樣列算式，算數字。教了一星期，朱法弟拿起自來水筆就能做加減法了。

後來算術課一步深一步，學會了加減乘除和四則題，還要做四則混合題。特別是應用題，朱法弟總是算不清楚，第一次測驗時她只考了40分。她看到那支自來水筆上刻着“獎給工業勞動模範”幾個字的時候，差一點要哭出來。她想：我在生產上從不落後，而在學習上卻落後了，還不是自己不肯鑽研下苦工夫嗎？在星期日回家時，她又把陳贊武找來問：“做四則應用題有什麼竅門？”陳贊武就把老師教他的話講給她聽。朱法弟照他的話做了幾個算術題，覺得有些門路了。後來兩人各做一門比較複雜的四則應用題，做好後一對，一點也不錯。朱法弟拍着手，高興地說：“是要多想多做啊！”

最近她考了一次算術，考題大部分是四則應用題。因為朱法弟平時肯用心鑽研，肯多問人家，結果考到了89分。當她拿出自來水筆，把考題重抄在練習簿上時，她撫摸着筆杆想：“現在這支筆拿在我手里也安心了。”

(1955年12月3日)

孩子幫媽媽學文化

沈家勸

張招弟原來是上海國棉六廠打包間女工，1952年，她被提拔為打包車間管理員。有一次，車間里打包紙快用完了，張招弟叫記錄員开好領料單，到供應科去領，但單子上要張招弟蓋圖章，她拿着圖章，東張西望，不曉得蓋在哪里好，結果把圖章蓋到“發料人”一項上去了。人家提意見，她弄得面紅耳赤，心里非常難過。

又有一次，是星期日，她想寫封保价信給她在揚州鄉下的婆婆，東請人寫，西請人寫，總是請不到。後來她跑到曹家渡五角場郵局旁邊測字攤上去，請測字先生寫。測字先生先問她“尊姓”，張招弟連忙回答說姓張，測字先生又問道：“弓長張，還是立早章呢？”張招弟吞吞吐吐地回答說：“我不曉得，我工作証上有名有姓，今天沒有帶來。”結果這封信還是沒有寫成。

張招弟因為不識字，不知道碰到了多少困難，心想上夜校去讀書，但是她又想想自己已經38歲了，怕學不進去，家里還有孩子，要做家務。後來她想到革命媽媽施小妹已經60多歲還在學文化，又想到自己蓋錯圖章和不會寫姓名這幾件事，她就下決心想辦法克服困難，拿到了工錢，就把米和油、鹽、煤球等買好，還請侄媳婦幫助料理家務，這樣，張招弟就開始上夜校學文化了。